

清代满族著名文学家

英和与奎照

牛植元 著

清代满族作家评介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清代满族著名文学家

英和与奎照

于植元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 沈阳

清代满族著名文学家

英和与奎照

Yinghe yu Kuizhao

于植元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4,030 开本: 787×1692 1/4 印张: 5 1/4
印数: 1—1,705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常 晶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赵多良

ISBN 7—205—00463—2/I·26

定 价: 2.15元

前 言

本书是英和与其长子奎照的父子合传。

英和是隶属于清廷内务府正白旗的满人。是历仕乾隆、嘉庆和道光三朝的名臣，是杰出的政治家和渊博的学者与优秀的诗人。《清史稿》卷三六三有传，只是过于简略。

英和生活在清代所谓的“乾嘉盛世”转向衰颓的历史时期，敏感的英和，目睹陈规陋习给各方面带来的危害日益加剧，便立志在他从政期间竭诚献替，锐意革新。他平生最佩服宋代程颢的一段名言，那就是：“治道从事而言，若救之则须变。大变之大益，小变之小益。”而英和更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胆地喊出：“事至今日，未有不当决然变计者矣！”他也真的身体力行，对各种积重难返的陈规陋习包括皇室的所谓“祖宗家法”，都不惜冒着极大的危险提出改革的主张。有的意见幸而被采纳，自然对当时的国计民生有所裨益，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臣；有的建议直接触及了大批保守派权贵的势位财货，一经提出，即惹起奸佞们的恼怒，不是“中外臣工多言其不可，诏停其议”，便是“诏斥其冒昧”，给予他冷冷的排斥。而英和本人却“不避嫌怨”，依然不改其锐意革新的素志。但这种状况是不会持久的，伺机报复的群小们终于找到了惩治英和的机会，借宝华峪皇陵地宫浸水案追究工程总监的罪责，竟置英和于死地。幸得不死，改为罚往齐齐哈尔服苦差。但一代名臣、一个勇于改革的贤才却自此一蹶不振。后虽遇赦归来，已是身心交瘁，百

感交集，不得不抑郁以终了。

但英和毕竟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和优秀的诗人，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却在文学园地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在被祸之前已是著作等身的多产诗人，编有许多诗文集。“赐环”归来之后，唯有借田园以娱晚景，借诗文以寄哀愁。而此时作品的思想内容却远胜于前期诸作。这便是我们对于他后期的作品更加重视的原因。

不论英和在政治上的业绩，还是在文学上的成就，《清史稿·英和传》的记述都失之过简。尤其对于他的文才和诗文价值竟至只字不提，这不能不是极大的缺憾。而历来的文学史上，更不曾有英和的一席之地，当然也是不公平的。

本书对英和的一生的经历、锐意改革的主张和行事以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皆做了尝试性的探讨，庶几可补《清史稿·英和传》之不足。所用诗作，皆从未曾公开的稿本中引来。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赓扬集》中存有一本诗稿，是英和66岁时的一本诗钞。今将其全部收进书中，并暂定名为《丙申诗稿》，这是英和晚年很有代表性的著作，故应予以重视。

下面再说奎照。

奎照是英和的长子。官至礼部尚书、军机大臣，富于文才，尤精诗词。但《清史稿》中不曾为他立传，仅在《英和传》末附述不到30个字的几句简介，根本涉及不到他的文学才能。而《八旗艺文编目》中也不曾著录过奎照的任何著作。幸而在英和的《赓扬集》中存有一册题曰《使青海草》的抄本，经过考证，确知其为奎照的诗稿。这个发现，为满族诗人增添了一员，也为《八旗艺文编目》提供了补写的著作。这部诗稿不过40首诗，但完好无缺，弥足珍贵。本书将其全部收存，一使读者得窥全貌，二防一旦原稿遭到损失。

目 录

前言

英 和

一、荣辱备尝的大臣·····	1
二、勇于革新的贤才·····	17
(一) 恶劣的政治环境·····	17
(二) 几项重大改革·····	20
(三) 几句小结·····	33
三、穷而后工的诗人·····	34
(一) 著作等身·····	34
(二) 两个时期·····	37
(三) 前期诗钞·····	38
(四) 后期诗论·····	62
四、丙申诗稿·····	80

奎 照

一、奎照和他的《使青海草》·····	96
二、奎照诗歌试论·····	104
三、使青海草·····	115
附:	
一、英和年谱简编·····	133
二、《英和传》·····	155
后记·····	159

英 和

一、荣辱备尝的大臣

清宣宗道光八年戊子（公元1828）农历九月份，朝廷中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案件：历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太子太保一品卿、协办大学士英和，和他当时任左侍郎的长子奎照、任通政使的次子奎耀，以及即补员外郎的长孙锡祉，祖孙四人同被革职，查抄并没收了全部家资，英和本人被逮捕入狱。经过审讯，先判死刑，后蒙宽大，改判为遣戍黑龙江罚做苦差。英和带领着两个儿子奎照和奎耀，踏上了奔向齐齐哈尔的征途。

英和是当时朝廷中数得着的大臣、能臣和贤臣，不仅在满、汉八旗和朝廷内外都享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在外国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位祖孙“四代皆以词林起家，为八旗士族之冠”的贵胄子弟，35年为三代皇帝“竭诚献替”劬劳供职，为什么突然遭此变故，落得个几乎家败人亡的悲惨下场？英和本人及其子孙究竟犯了何等重罪，会受到如此的重罚？人们都在认真地关注着。

原来，处治英和的罪状是轰动当时朝廷内外的一起重案，即所谓孝穆皇后宝华峪皇陵地宫浸水案。事情是这样的：清宣宗道光皇帝即位后，即着手为安葬他去世的皇后——即所谓孝穆皇后而经营皇陵工程。在王佐村选定宝华峪这个“万年吉

地”后，责成英和与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和少司空阿克当阿四位大臣共同承办全部工程，而英和是首席的工程总监。道光元年辛巳（公元1821）九月开始破土动工。一向富有改革精神的英和，在临事之际总有一些革除积弊的设想。尤其对于有关天子出巡、狩猎、祭祖等在当时被视为重大典礼的活动，他都认为应该极力减少次数和紧缩用度。所以，他在一接受这项皇陵工程总监的任务后，立即“议于旧制有所裁省”。为了找到先例，他也采用“托古改制”的方法，引前代贤君为榜样，“从容言汉文帝节葬事”，遂将节葬的精神运用到这个皇陵工程中去。因此，在奠基之始，曾于“后山石中见有水滴，因系废槽”，英和便不想在地基的修整上多化时间和用费，“仅以土拦”即正式施工。当时也曾有人“议设龙须沟出水，英和未允状”，省去了排水设备的工程。就这样，历时七年，到道光七年丁亥（公元1827）九月，皇陵竣工，举行了孝穆皇后的灵柩“奉安”典礼，一时平安无事，皆大欢喜。而事隔一年之后，即道光八年（公元1828）九月，发现了皇陵地宫浸水。道光皇帝大怒，“谴责在事诸臣”，英和是工程总监，在职务上首先要他承担主要罪责。但更重要的是英和在动工前和施工时的言行成为被判处极刑的根据。他是有意要在皇陵工程中“有所裁省”，又引汉文帝节葬事做为先例，而施工时“见有石母滴水，仅以土拦”，不接受别人开设龙须沟排水的建议，等等，终于被人“引应奏不奏例 比拟大辟”。这擅自作主的欺君之罪，是被看成死有余辜的。幸运的是，“太后为上言，不欲以家事诛大臣，乃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死罪免，活不饶，英和父子三人经过将近半年的长途跋涉，于道光九年己丑（公元1829）二月，到了当时的边荒地带——卜魁城。

卜魁，又写作卜奎，是满语的“布克依”的音译，旧址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旧城区。荒凉苦寒之地，是当时谪戍流放的典型地区。英和父子在这里的生活景况从物质待遇上看并不算太苦，英和的门生故吏们并没有眼看着这位一心报效朝廷的名臣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他们对英和父子有一定的接济。即如当时尚在显位的穆彰阿和孙尔准，也都对英和有可观的资助。但对英和说来，最苦的并非饮食起居上条件的低下，而是一腔忠君报国的热忱却从此心灰意冷。幸而皇恩浩荡，两年之后，即道光十一年辛卯（公元1831）三月，奉旨“赐环”，五月份回到北京，由于“产亦入官，赦回后，无棲止处”，处境是极为凄惨的。英和此时，已是年逾花甲，身心交瘁的老人。朝廷对他不再叙用。英和自己遭此变故后也恍如大梦初醒，惨重的教训和35年来的宦海风波，使他开始觉悟到在已处颓势的国家中，靠几个忠臣的竭诚献替非但无补于事，其结果只能是自取灾殃。能全要领，应该说是幸中的大幸。他深感到自己过去的夙夜匪懈只不过是一种痴顽的徒劳。这从他一到谪戍地后，立即更名曰“胥叟”——愚痴的老人，便可看出他悔恨和悲苦的心境。对于遭到沉冤而处于悲惨境地的人们说来，麻木不仁和迟钝的人要比有事业心而又敏感的人要幸福得多。这位才能出众，识见超群，历仕三朝的太子太保，如今憔悴归来，面对着京华烟云，真有着恍如隔世的沧桑之感。所以，在此后的10年里，他只能退守田园，借诗文以寄哀愁，到道光二十年庚子（1830）70岁时抑郁而终。遭变后的英和的诗风比起前期有着几乎是根本性的转变，从一贯歌功颂德而为金刚怒目式的揭露和谴责因而，晚年的英和写了许多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完美的诗歌。清朝廷毁掉了一个政治家，却成就了一位诗

人。如果他的政治生涯始终一帆风顺，也许官秩会不断地升迁，但在当时的政治形势束缚下，相信他不会有所建树，也不会写出反映现实的诗歌。鲁迅在论及平静的生活不利于诗人的创作时，引用了匈牙利爱国诗人彼兑斐（今译裴多菲）的话，认为诗人“是苦恼的夜莺”，而有时会“沉默在幸福里”。因而他说，要“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这里之所谓“甜美”当然是指富有内容而又优美的诗作。宋朝的欧阳修也曾说过，诗人的创作，“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英和就是“穷而后工”的诗人。鲁迅在引用上述彼兑斐的话之后，作了周到地解释，他说：“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斐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引见《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对于英和生活的那个封建时代说来，更应是真实的。

前面，我们只是概括地介绍了英和所遭受到的一次重大变故，这只是英和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侧面。至于英和的家世、经历和生平的思想以及文学上的成就，仍得从头分别论述。

英和，姓索绰洛氏，字树琴，号煦斋，汉名石桐，满洲正白旗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公元1771），卒于道光二十年庚子（公元1840）。英和生于父亲德保广东巡抚任所，故又名粤溪生。57岁因宝华峪皇陵地宫浸水案被遣戍到齐齐哈尔后，又取号曰“胥叟”。为清中叶之嘉庆、道光年间名臣，《清史稿》有传。

英和的先世起于混同江东北弗阿哈之地，译名“旧阜”。清兵入关时，英和的五世祖布舒库随军进入北京，又随将军亲藩西征有功，即归内务府管辖，自此世世为内务府正白旗

人。四世祖都图健壮骁勇，作康熙帝御前亲随。康熙帝“嘉其身健如石，赐姓石氏”，此后即以石氏为族姓。到英和的祖父明德时，入关的满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的传统文化，贵族子弟已和汉族士子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英和的父亲德保便以词林起家，中乾隆二年丁巳（公元1737）科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屡掌文衡，三典乡试，五典会试，三任学政，故溢曰“文庄”《清史稿》有传。自德保开始，索绰洛氏家族便从军功门第转而为书香世家，成为整个清代的“八旗士族之冠”。

英和便是在这样一个优越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少英俊才”，5岁即认字，9岁学满文及弓矢，12岁学诗，在当时的八旗子弟中崭露了头角，引起乾隆时的权臣和珅的注目，多次托人说亲，“欲妻以女”。而英和的父亲德保在这一点上颇有识见，他鄙薄和珅的为人，终于婉言谢绝了求婚的事。恼羞成怒的和珅本即奸狠，从此便更加仇恨和排斥德保父子。少年的英和已经觉察到和珅的阴谋，用巧妙的手法脱开了对方的陷阱，终于在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公元1792）22岁时中举，23岁时成进士，并受到乾隆皇帝引见，即选庶吉士，充武英殿协修、纂修。一个青年的文臣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仕宦生涯，此时这已是乾隆末年。

乾隆皇帝在他在位的第六十年（公元1795）传位给儿子颙琰——即所谓清仁宗嘉庆皇帝，乾隆自己则作了太上皇。乾隆在清代帝王中是最重文采的一个，他在召见英和时，发现这个青年的学识和诗才都超出他的同辈人，即让他赓和自己的《观麦诗》。又让英和大胆地评论他的诗作，而不需一味颂扬。英和的评论博得了这位太上皇的赞赏，认为他“颇有见解”，而且“奖励再三”。这可以看作是一次特殊的廷试，

皇帝亲自作了主考官。这个廷试，已初步显示出英和的个性特征，即不仅卓有识见，而且敢于把自己的见解坦率地表露出来。确乎是“人本明白，性复敢言”的。

嘉庆皇帝在位共25年（公元1796—1820），这25年，是英和一生的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阶段。如果再加上乾隆末期的3年和道光初年他遭到变故前的7年时间，英和历仕三期，共35年，正好占去他整个一生的一半。按三期的阶段来观察英和的处境，可以说，乾隆末年初登仕途，崭露头角；整个嘉庆年间，他大显身手，充分显示了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干才；及至道光初年，他已是为朝廷所倚重的三朝重臣；恩荣达到顶点。但也泰极否来，突然大祸临头，自此一蹶不振。而在诗歌领域，则做出了他的同僚们难以企及的贡献。

封建社会的大臣之所以得据要津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其中尸位素餐者固属不少，但因真有才干而被重用者亦偶尔可见。英和在未遭变故前的屡任要职是属于后一类。他是文才武略兼备的能臣，军、政、文三方面他都担当过多种较高的职务。先从将军和都统这几种官职上看，即可见一斑。英和在34岁时即授军机大臣，更历任满、汉八旗的正、副都统等职，又做过热河都统和宁夏将军。清王朝定鼎初期，八旗首领仍沿用满语旧称，每旗设“固山额真”一人，左、右“梅勒额真”（后改称“梅勒章京”）各一人，为八旗组织中每旗的最高长官，执掌一旗的户口、生产、教育和训练。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后，官名始改用汉字，称“固山额真”为都统，“梅勒额真”（“梅勒章京”）为副都统。八旗有一定的排列顺序，即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和镶蓝。前三旗的镶黄、正黄和正白的地位最高，重要职位皆自

此三旗中选拔人才。后五旗为下五旗，地位较低。英和一生除未在正黄旗任职，其余七旗皆曾多次任都统或副都统。即以上三旗而论，他即在镶黄旗担任过两任都统，一任副都统；在正白旗里，他一任汉军正白旗副都统，两任满洲正白旗都统。至于下五旗的正副都统职务则多次担任。据所知至少有以下的情况：先后担当正红旗满洲都统和正红旗汉军副都统各一任；镶红旗满洲都统二任；镶白旗满洲都统二任；正蓝旗满、汉军副都统各一任；正蓝旗满、汉军都统各一任；镶蓝旗汉军副都统二任，满洲副都统一任。其中尚夹杂别的有关职务多种，即不再赘。比如权力较大的步兵统领他也担当过。

清代中央的行政官制仍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大部，各部设尚书和左、右侍郎为行政长官。这六大部中，各部职权的轻重有不同。由于重文轻武，兵部并不真的过问军政和军令，实质上无大作用和地位；而权力最重大的则是户部，这与唐、宋恰恰相反，它是清代唯一的财政总机构。因此，从表面上看，同是六大部的尚书或侍郎，但实质上户部的职权之重，绝非其他五大部可比。而英和一生，只未在职权最次的兵部任职，其余五大部他都担当过或左、右侍郎，或尚书的要职，而其中以在户部任职的次数为最多。他曾一任户部右侍郎，四任户部左侍郎，直到任最高首脑尚书为止。其余四大部中，据不完全统计，至少他曾任吏部侍郎、尚书；礼部左、右侍郎；刑部侍郎；工部左、右侍郎，直至尚书。除此之外，又担任过理藩院侍郎，34岁时授军机大臣的同时，又加太子少保衔，赐一品补服，享受紫禁骑马的荣耀。直到后来，又加太子太保衔，授予协办大学士的要职。异常的恩遇，在当时不禁为同僚所艳羡，英和本人也真正是受宠若惊。即以紫禁骑马的待遇而论，他自己当时曾激动地说：按

旧制，“大臣官至一品，年逾六旬，方赐朝马”，而自己此时才“年三十四，得有代步，宠荣极矣”！此时的英和，可真算是青云得路的上升期。

英和的文才曾得到三代皇帝的赏识，在任用上也超乎常人。科举取士，是明、清两代笼络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当然，也通过这一途径选拔一批官吏。英和即曾多次担当各种类型的主考官或阅卷官。《清史稿》上说他“屡掌文衡，爱才好士”是有根据的。即以所知而论，自嘉庆三年（公元1798）他28岁时起，到道光二年（公元1822）他52岁时止，24年内，他先后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充顺天乡试正考官，嘉庆四年（公元1799）充会试同考官，嘉庆五年（公元1800）充顺天乡试副考官，嘉庆六年（公元1801）充江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七年（公元1802）阅新进士复试卷，勘磨会试试卷、充武英殿阅卷官、阅朝考卷、阅拔贡朝考卷、阅考试缮本笔帖式试卷，等等。嘉庆十年（公元1805）充会试副总裁，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充顺天乡试主考官。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充恩科会试副总裁。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阅新进士复试卷，道光二年（公元1822）充会试正总裁，等等。又因为他是内务府正白旗人，出身高于一一般的旗人，加以自幼学习满文和弓矢骑射，即常担当满洲八旗内部的文教稽察官员。按清代八旗的编制，不仅有上三旗下五旗之别，而且又按方向定其位置，以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居左，称为左翼；以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居右，称为右翼。英和曾主管过右翼幼官学，又多次稽察左、右翼觉罗学，更稽察过右翼宗学，在满洲八旗内部，是属于在文教方面既精通汉文，又长于满文的权威人物。唯其如此，在当时的文史机构中英和也担当过重要的职务，比如续纂《四库全书》总

裁，《会典》馆总裁，武英殿总裁以及重修《明鉴》总裁等。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官职之高并不说明德才不低下，而真有才能的人物，又绝非用官职可以局限它的作用。英和既是才干与其官职可以相副，又是在官职之外从事了大量有益于当时国计民生活活动的人物。即如他多次奉旨奔向边远地区去裁断上诉案件，都是亲自将有关人员尽量寻到，一一查询，直到弄清真相为止。这里面有下级控告上司，也有小民揭发王公大臣，他基本上做到了按法律行事，未见他徇私或回护。在这一点上，英和真有点包公遗风，是颇值得肯定的。又如英和长期在户部供职，由于他的精明和认真，于当时国力和财力皆知之较详，常在关键时刻提出有见地的决策，富有改革精神。谁都知道，在清代官职中最能攫取钱财的肥缺是盐、漕、河三方面的官员，而英和都曾亲加勘察，摸清实况，揭出弊害，提出改革的方案。这当然损害了一大批官僚们的实利，惹起他们激烈的反对，并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而最高统治者从来都是群小们理想的代言人，所以，英和的献策多被阻挠而难于实施。比较好的回答是否决了英和个人的提案而“仍依众议”，较甚者则是“中外臣工多言其不可，诏停其议”，以至“诏斥其冒昧”，等等。从后果看，部分采纳了英和的创议，即部分收到可喜的成效；未被采纳者，只能使人徒唤奈何而已！《清史稿》上说他“才不竟用”是有道理的。但历史是无情又是最有情的，今天我们研究有清一代的历史，不仅在所谓乾嘉盛世的大政方针上许多方面要给英和以应有的席位，即使在盐、漕、河、矿、文、史诸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英和的作用和功绩。在中国历史上，英和是一位值得重视的人物。

要全面了解英和，对清代史乘和其他有关记载中，论及英和的几件不可忽视的事例，有必要做一点探讨。至少对英和父子与和珅之间围绕拒婚一事所展开的斗争、英和50生辰得到皇家为他祝寿的旷典恩荣以及《清史稿》中所谓“才不竟用”、“数以罪黜”这三件大事，有必要弄个清楚。

首先是对和珅的拒婚事，前面已有所涉及，有人认为，由于英和的父亲德保为拒婚得罪了和珅，遭到和珅的排挤。及至嘉庆皇帝即位，和珅伏诛，其时德保已去世多年，而英和则正在朝居官，嘉庆皇帝“知其拒婚事，嘉焉，遂响用”。好象拒婚一事便成为英和在嘉庆年间得到重用的因由。德保生前敢于对气焰煊赫的权臣和珅多次拒婚，应该说这是德保的可贵之处。但认为单凭德保拒婚一事，便成为英和得以在嘉庆朝重用的原因，这实际是对英和的贬低和歪曲，好象他只不过靠先人的骨鲠为自己找到了终南捷径。事实上，拒婚一事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可作为主要的依据。且看嘉庆四年（公元1799）五月，英和29岁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在皇帝召对时的一段对话：

“谕曰：‘汝家事朕皆深悉，惟当日和珅如何欲与汝缔婚，汝父何言以谢，其直陈无隐。’”对曰“臣年八岁时，和珅初为侍郎。至臣家适遇臣于门外，但问臣年几何，别无他语。及臣十一岁，一日，臣父退直，谓臣母云：‘白发夫妻，日增老境，当早为儿授室。今日在公所，见八旗秀女中有原任漕督阿思哈之女萨克达氏，未经记名，可即邇婚灼，并定于十三岁来归。此外别无所闻。迨臣父亡后，大学士阿桂向臣言当日和珅倩内务府大臣金简为和珅之女作伐，臣父婉辞，阿桂稔知其事。’仁庙嗟叹久之，谕曰：‘汝父生前，受和珅之谤多矣。’因泣对曰：‘不独生前受谤，身后遗摺，尚为

遏抑。’次日，蒙特旨，赐先公谥文庄，并追谥前礼部尚书先世父观保文恭。”

这只能看出嘉庆皇帝对德保和观保的“特恩追谥”并未对英和有什么“响用”。此后对英和的升迁，也还是按正常方式进行。而英和本人在初露头角时，却与和珅做过机智的斗争，而且使和珅的圈套落空。清人姚元之是英和的门生，他对英和的家事知之颇稔，他在其所著《竹叶亭杂记》里有这样的记述：

“煦斋先生未婚时，和珅欲妻之。德文庄公辞焉，和衔之。乙卯，先生以庶常散馆，和密令试者索诗稿，记其句，将欲黜之。是日有索稿者，先生辄与之。及缮写，则别为一诗登卷。次日阅卷，遍索先之卷而不得，是科满洲留馆只先生一人。和由是日快快。故文庄公扬历中外垂四十年，率不得一谥，嘉庆年始追锡易名典焉。人皆服文庄之识远，先生应事之能焉。”

这里看出和珅这个汉臣的卑劣和阴险，拒婚会使他的面子有损，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想摸清英和考卷的诗句，有把握地予以黜免。而英和的敏感和机智竟使这个老奸贼也受了捉弄，当然要“日快快”进一步报仇雪恨了。这一事件，有助于我们了解和珅的为人。在封建社会里，一个权臣由于求婚不成而竟至于如此怀恨，欲加害于对方父子全家而后快，和珅的奸险自不待言，乾隆皇帝的晚年对他倚任极专也是很昏庸的。这是第一件事。

其次是英和50岁庆寿一事，英和本人和当时的知其事者都认为这是异常的恩遇，是前未曾有的“旷典”，这是应该说的。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是嘉庆在位的最后一年，